

# 《可洪音義》與佛典校勘專題·序言\*

釋知如、釋慧法、林恒卉 合著

107 學年第 2 學期，萬金川教授於博士班開了一門「佛典目錄版本學」，課程中首先藉由呂澂先生的〈宋藏蜀版異本考〉<sup>1</sup>為切入點，探討了諸刻本藏經的源流與傳承。學界一般將這些藏經分為三系，即屬於北方系的契丹藏，屬中原系的高麗藏初雕本、再雕本、金藏，以及屬南方系的浙本思溪藏、磧砂藏，閩本崇寧藏、毗盧藏。呂氏的觀點認為刻本系統藏經都有一個共同的祖本，是以《開寶藏》不同時期的修訂本（淳化、咸平、天禧、熙寧、崇寧本）為底本進行刊刻；而李際寧、李富華、何梅等<sup>2</sup>則認為三系藏經是分別依照四川、中原、福州三地的不同寫本刊刻而成。

然得出此二觀點的推論方法並不相同，呂氏乃通過其獲覽的三百餘卷《金藏》廣勝寺本以及其他諸刻本，詳考其內部證據，「取以對勘諸刻，旁參記載，乃畢見其源流」；而李氏等除了推測三系各有其依據的寫本外，主要以歷史、經錄、版式、牌記等外部證據進行推測，很少從內部證據，如用詞、異體字、音義書來考察，讓文獻自己說話。雖然在佛典校勘中，內、外部證據都應參酌，但相對於外部證據的易於模仿、篡改、偽造，內部證據似乎更為可靠。然而，令人稍感遺憾的是僅極少數人

---

\* 本專題由「悲廣文教基金會專案研究獎助」所贊助，特此致謝。

<sup>1</sup> 呂澂〈宋藏蜀版異本考〉，收於《圖書月刊》第 2 卷第 8 期，中央圖書館發行，1943 年 2 月，頁 3-7。

<sup>2</sup> 李際寧《佛經版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2 年。李際寧《漢文大藏經研究論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

是建立在內部證據——印本之間的詳盡對勘上進行論證。直到柳富鉉 2014 出版的《漢文大藏經異文研究》一書，採取校勘學的方法，分析了各版藏經之間的異文，<sup>3</sup>才見有學者嘗試以內部證據來探討三系藏經的發展源流。

其後，萬老師演示運用內部證據的校勘方法，分別以〈《金藏》興國院本與廣勝寺本《毗沙門天王經》對勘〉、〈異文的類型分析與藏經的源流考辨——以《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諸本對勘為例〉<sup>4</sup>兩篇文章為例，嘗試對呂氏一說的可信程度進行若干核證，後文更是以唐末五代漢中沙門可洪的《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略稱《可洪音義》）進行校勘，所校出之異文不僅「出其異同」，亦予「勘定是非」。

作為寫本時代遺留物的音義書，是中國傳統小學與漢譯佛典結合的產物，在整體佛教典籍中頗具特殊意義，此乃反映出「佛教中國化」的一種學術實踐，在藏經從寫本到刻本流變過程的考察中或許能提供我們雖非唯一，卻很重要的線索。

以往學界對漢譯佛經的關注，主要集中於音譯或意譯的文獻內容，而部分中國撰述類經典則是作為研究中國宗派佛教的文獻來看待。音義書是中國僧侶在披覽、閱讀藏經時，摘取經文中較冷僻的字詞後，對其形、音、義進行的解說，為古代閱

<sup>3</sup> 柳富鉉《漢文大藏經異文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

<sup>4</sup> 萬金川〈《金藏》興國院本與廣勝寺本《毗沙門天王經》對勘〉，《正觀》第 91 期，南投：正觀雜誌社，2019 年。氏著〈異文的類型分析與藏經的源流考辨——以《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諸本對勘為例〉，見《2019 佛教藏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2019，頁 43-44。

藏的工具書。音義書之中、印學術結合的特性，使其在佛典校勘中，具有他類文獻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長期以來音義書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

近來對音義書的研究，主要著重於唐代玄應與慧琳依據官藏編輯的《一切經音義》，特別是由徐時儀的團隊所點校出版的玄應、慧琳、希麟三部《一切經音義》的成果最為顯著。但可洪依據民間藏經所作的《可洪音義》，目前對其之研究卻寥寥無幾，仍待拓展。

《可洪音義》是以《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為架構，對藏經進行審音、定形、釋義的工作。由於可洪當時所見的藏經是廣採十六種的民間寫本，與玄應、慧琳使用之具權威性的官藏不同，故而其音義能夠更真實的反映當時的用字情況，今僅存孤本而見於再雕本《高麗藏》，近年來漸漸受到漢語史的學者重視，尤其在文字史的研究上別具價值。然而，學界對此書的研究大部分僅限佛經語言學，很少作為校勘的材料。當前雖不乏有學者使用，甚或逕自引用，但誠如萬老師於〈《可洪音義》與佛典校勘〉中所指出的，洪書雖已被視為重要的研究材料，不過一般學界所使用的文本是未經校勘的文本，很可能存在著傳抄、刻工、寫手所出的錯誤，<sup>5</sup>以至於在脆弱的基礎上做研究，

---

<sup>5</sup> 萬金川於〈《可洪音義》與佛典校勘〉一文中，指出洪書至少具有三個獨特性：  
（1）以《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的藏經架構，進行審音、定形、釋義的工作；  
（2）審音、辨形與釋義直截了當而鮮見書證；（3）所據藏經版本極其多元，而可洪此書所參用的藏經版本竟高達 16 種之多，同時作者本人又兼具強烈的版本與校勘意識。進而，指出了現今學界所使用的底本僅僅為《大正藏》，

故極有必要重視校勘的工作。

在校勘的材料和方法學上，衣川賢次的〈以敦煌寫經校《大正藏》芻議〉展示了一個典範。該文分別以譬喻經典——《法句譬喻經》和大乘經典——《維摩詰所說經》為例，從寫本與刻本之間的差異中擇取若干校證，呈顯出寫本中所保存的古老型態，而刻本往往有修改的傾向，從而導致對原義的誤解，指出早期的古寫經作為校勘材料，具有不可輕忽的地位，應予以重視。<sup>6</sup>

由是之故，我們的期末報告便是立足於諸位前輩的研究所得之上，以《可洪音義》為主要題材，運用校勘學、佛經版本學的知識著手探析。期末報告完成之後，在萬老師的指導下，又透過一學期的讀書會逐篇進行口頭發表與檢討。本專題的三篇文章便是在此基礎之上修改而成。

三篇文章分別以《出曜經·念品》、《四分律·尼戒前二篇》及《本事經》卷三為校勘文本，操作方式為：先將《可洪音義》對此三個範圍所出的詞條進行校勘，進而利用《可洪音義》來校勘這三部漢譯佛經，最後歸納校勘結果，並以此進行異文類

---

並未覆按其底本《高麗藏》，如此可能錯殺忠良（註 17，頁 108）。文末更再度呼籲，電子文本充滿訛誤，絲毫不堪學術使用，研究者如需使用，務必覆按紙本或刻本圖檔而自行校勘。氏著〈《可洪音義》與佛典校勘〉，收於《漢傳佛教研究的過去現在未來》會議論文集，宜蘭：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2015，頁 93-114。

<sup>6</sup> 衣川賢次〈以敦煌寫經校《大正藏》芻議〉，收於《轉型期的敦煌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403-434。

型分析。藉由分析校勘所呈現出的異文類型，印證了呂氏在 1943 年的推論的可能性。雖然三者操作的方式相同，但欲解決的問題與研究成果有所差別。

首先，〈《可洪音義》所出〈《出曜經·念品》音義〉之校勘〉一文所校勘的 19 個詞條顯示，可洪的判斷與注釋大抵正確，其中校出的訛字往往是出自寫手或刻工之誤。此外，藉由寫本與刻本的比對也再次核證了衣川氏的研究成果，從寫本階段到刊本階段，不僅僅產生字形的變換，也包含詞語的改動，如此更加肯定日本古寫經及敦煌寫本在校勘上的價值。從異文類型可推知，呂澂的觀點大抵可以獲得核證，即三系藏經的底本皆為依據《開寶藏》，但其中包含了不同時期的刊本。不過從所依據的底本為最後的修訂本——熙寧本的《昆盧藏》重蹈了淳化本之錯誤的案例來看，南方系是否完全以《開寶》校訂本為底本，則有待進一步探究。

第二篇〈《四分律》尼戒前二篇校勘及異文類型分析——以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所出詞條為主〉透過逐字逐版的校勘得出百餘條異文，從異文類型分析可以看出：諸藏中最大的源流即是中原系藏經與南方系藏經各自系統內的一致性，兩系統的藏經除行款裝幀、收錄經目、經帙序號這些外在差異，更有其版本源流上，諸如用字習慣，甚至一些語序上內文性的實質分野。同時這樣橫切面的空間比對，其實也反映出其縱軸上的歷時性，即各藏所依底本不斷校勘，進而造成各個藏經的區別，兩類（各自系統，以及早晚兩期）其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就是說據《開寶藏》淳化初印本的《高麗藏》初雕本，據《開寶藏》咸平初校本的《金藏》廣勝寺本，據《開寶藏》

天禧再校本的《高麗藏》再雕本，據《開寶藏》熙寧校定本的南方閩、浙諸本等諸藏之間，既有地緣上的中原、南方系各系統共性，也是其歷時性、依據《開寶藏》各時期不同版本之由；除此最主要特徵之外，各藏亦有其自己獨特的個性樣貌，這反映出在系統之外不同因緣下的校本，如再雕之以《丹藏》參校，南方之潤改等，不過這些較之於最主要的中原、南方兩系，或早晚兩期的大分類而言，已然是各自細微的差別。

第三篇〈《本事經》〈卷三〉之校勘——以初金再思磧新諸藏經版本暨可洪、慧琳音義等之考察〉主要以沙門守其《新雕校正別錄》中，所指出《本事經·卷3》中的四處訛誤進行《初雕》、《金藏》、《再雕》、《思溪》、《磧砂》等藏經刻本之校勘，再輔以《可洪音義》與《慧琳音義》等音義本之他校。為了釐清訛誤，本文也將《本事經·卷1-3》每卷經文的結構做了表格分析。在《新雕校正別錄》中，守其所指訛誤主要在於重寫之內容，不禁令筆者推敲著訛誤之因素，關於訛誤始見於《初雕》及《金藏》之中，那麼是在《開寶藏》開雕時就已刻入？還是《初雕》時訛入？因此《金藏》承其誤？還是抄(寫)手？刻手？版本等其他之問題？……本文首先透過日本《聖語藏》天平寫本(公元740)與《初雕》、《金藏》、《再雕》、《思溪》、《磧砂》等刻本對校之後，也確認了沙門守其所指訛誤之實，但仍有不盡其全面之處，將於本文中論及；同時根據了音義書的他校，也發現了沙門守其在校勘版本上的一些問題，似乎也印證呂澂先生所判定的蜀版有五種版本之說，此乃本文之價值所在。另外，從寫本到刻本，本文也跨越了時空一窺歷代以來，關於

藏經勘刻與校勘的種種現象。

本次專題旨在拋磚引玉，俾使更多研究者關注《可洪音義》在佛典校勘上的價值。

最後，非常感謝萬老師長時間耐心的指導，在課程結束後，到了下一學期仍持續每週利用一個晚上的時間，義務為我們舉辦讀書會，一一指正每一篇報告的缺失，讓原先對校勘懵懂無知的我們有機會踏入佛典校勘之途，逐步建立起對此領域的知識和觀念。

而在修改過程中，適逢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添購《聖語藏》天平十二年御願經第一回配本，其中正好有與校勘文本相關的經典，感謝佛研中心提供申請使用的服務，解決不少先前因無法取得寫本而不得確認的疑點，特於此深表謝意。